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文化与文化自觉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费孝通 著

(下)



# 文化与文化自觉

CULTURE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下

费孝通

著



群言出版社  
*Qunyan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与文化自觉:全2册 / 费孝通著.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12. 6

(民盟历史文献)

ISBN 978 - 7 - 80256 - 323 - 0

I . ①文… II . ①费… III . ①费孝通(1910 ~ 2005)  
—文化思想—思想评论 IV . ①K825. 4②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025 号

出版人	范芳
责任编辑	方醒
助理编辑	张天放
整体设计	群言艺术设计中心
出版发行	群言出版社(Qunyan Press)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
邮政编码	100006
网 站	<a href="http://www.qypublish.com">www.qypublish.com</a>
电子信箱	qunyancbs@126.com
总 编 办	010 - 65265404 65138815
编 辑 部	010 - 65276609 65262436
发 行 部	010 - 65263345 652202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读者服务	010 - 65220236 65265404 65263345
法律顾问	中济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mm 1/32
印 张	20
字 数	4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6 - 323 - 0
定 价	68.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目 录

前言 / 1

序 / 1

## 上册

- 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 / 1  
从“社会进化”到“社会平衡” / 7  
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 / 16  
文化的物质面与精神面 / 21  
评《文化新论》 / 27  
文化论与社会学 / 45  
关于对待民族民间文艺遗产的一些意见 / 47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 / 54  
《人文类型》重版前言 / 57  
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 62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 68  
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 / 112  
孔林片思 / 124

- 寻根絮语 / 131  
对“美好社会”的思考 / 142  
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 / 149  
面对世纪之交 回顾传统文化 / 176  
继承优秀文化传统 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 180  
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 / 183  
晋商的理财文化 / 190  
黑龙江行 / 198  
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节选) / 209  
东方文明和二十一世纪和平 / 226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节选) / 235  
开创学术新风气 / 240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 246  
人文价值再思考 / 265  
完成“文化自觉”使命 创造现代中华文化 / 288  
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节选) / 293  
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 / 300

## 下册

-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 309  
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 / 333  
文化的传统与创造 / 342  
关于文化交流 / 357

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 363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 368
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 / 375
新世纪新问题新挑战 / 410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 425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 441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谈话 / 457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 478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 482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 490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 / 505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 521
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 534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 539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 551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 582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 603
跋 / 623

# 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 ——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

费：今年春天全国人大换届的时候，我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退而未休。你也到了退休的时候了。我们有这点共同的地方。我想我们找这个机会见见面，谈谈我们今后的打算。我的生命大概还有几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看我们今后做点什么事情好。

前些天在北大研讨班上的讲课插话里，我讲到了自己最近几年的一个感觉。85岁以前，我天天在那里忙着做事，不觉得自己老，有点“不知老之将至”，这是确实的情形。过了85岁，感觉到自己有点老了。做事情吃力了，力不从心了。要做的事情做不成了，要走的路走不动了，想写文章力量不够了，写一阵就要休息了。感觉到自己衰老之后，对生物性的个人同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个人之间的不同，看得比过去清楚了。生物性的个人是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天命，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过程中，同别人打交道时真正接触和发生作用，实际上不是个人的因素，而是社会性的因素，文化性

的因素。这些因素是超越了人的生物性的个体存在的。人可以死,可是人所处的这个人文世界却是长存的。人文世界的延续过程不但比我们个人的寿命要长,而且它的意义也更大。一个人从进入这个世界到离开这个世界,最长不过百年。在这段时间里边,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过来已经创造的文化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一些事,为人文世界增添了一点东西。这点东西会留在这个世界上,不管好事还是坏事,抹不掉,也改不了。作为当事人,在老而未死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自己在世界上留下了点什么。这是一种老来的心态,很有意思。年轻人不大想这个问题,还想不到这个问题。我今年已经 88 岁了,算高寿的人了,想到这个问题了。今天你来,我想对你说说我心里的打算,同时也想听听老朋友的意见,希望我再做点什么事。这会影响到我今后几年的生活。这两年我出去走走,感觉身体还可以。医生做检查,也说没有什么大毛病。在生命的最后这段时间里,我想做点人家希望我做的事情,也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所以我想趁我们聚谈的机会,交换一下看法。

李:我很高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您说是聚谈,这是您对我的客气,我应该说是请教。我是从今年 7 月份开始退休,也想学着费先生做人做事的办法,退而不休。虽然离开了正式的职位,但是学术研究工作还要继续下去。清华大学(新竹)要给我一个荣誉讲座的工作,每年还有一笔经费,可以做研究用。我在中央研究院(台北)还有一个最近确定下来的研究主题,跟养气有关。题目叫《文化·气·传统医疗》。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在认识客观世界上的一个最本源的区别,是用身体与心灵的内在

体验的方法来了解世界。这个课题需要进行好几年，希望能通过研究来解释这样一种中国认知和传统的根源是怎么样的。我就要开始下一段的研究工作的时候，能有机会向费先生请教，我感到很难得。

费先生很客气，在计划今后几年做事情的时候，想听到我的意见。我首先想说的是；您在此前所做的事情，比别人多得多。虽然现在年纪老了，但是您正在思考的问题，正在发展的思想，对整个学术界还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我昨天晚上还在想，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的贡献，既有理论上的一面，又有实际上和实用上的一面。这是一般的学者很不容易做到的。您有一个“志在富民”的愿望，把学术研究作为实现这个愿望的工具，开辟了很多具体的研究题目，使田野调查既产生了理论的学术成果，也收到了具体的富民效果。一般做研究的人，大半不难想出一个很理论的东西，但是未必实际可用。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里边就辩论了这一点。我认为一个好的学者不一定纯粹是理论的，在应用上面做出实际的贡献，也许更重要一点。所以我觉得您的“志在富民”的学术实践非常重要。您从对乡村的研究到小城镇，到对整个大的区域的格局和战略性的研究，不仅具有促进国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而且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开拓意义。过去人类学家研究的多是一个很小的村落，不大容易跳得出来。而您实现了从村落到小城镇又到大区域的跨越，这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志在富民”这四个字，我听着是响当当的。一个读书人读到了“志在富民”这样的境界，而且真的做出了实际的贡献，确实难得。

我昨天读到了您赠送的新书的序言。您在讲《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这个题目时所表达的思想,又是非常之重要。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前途做出分析,提出设想,主张不但“各美其美”,而且要“美人之美”,在人类为进入21世纪而做的各项准备当中,这一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球村,容忍多样性应该是大家在互相交往当中的一条基本的共识。亨廷顿写《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就是认定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回教文明一定会有冲突,怎么避免这种冲突是重要的。对这个问题,人类学家的主张似乎要更积极一些,不仅是避免冲突,也不仅是容忍别人,而且还进一步到欣赏别人。您提出的主张,是人类学家面对世界问题而做出的积极性、建设性姿态的一个证明。

我想,在我上面说到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实践的方面,怎么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更进一步地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一个是在理论的方面,怎么使整个人类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走向天下大同的发展前景,这是我在您的著述当中体会到的两个最重要的主题。您为这两个主题已经花费了大量的心血,写出了很多重要的篇章。但是从更久长的历史来看,也可以说是刚刚破题。您离百岁还有十多年,还有机会也有力量进一步思考。这十多年里,在这样两个主题下面的社会发展还会提出新的问题,推动您进一步思考。您的文笔实在是漂亮,思考得又深入,可以不断地加一点,再加一点,把更加厚重的东西留给后人。我有一个书柜,专门放您的书,台湾出版的也都完整。前些天我又翻了翻,总的感觉以上面说的两个方面最为突出。我希望看到

您在这两个方面的思考有更进一步发展。

费：我昨天送给你的这本书，书名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表示了我的科学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就是实际生活，就是人民发展生产、提高生活的实践。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人生的天平”，这是吴泽霖先生提出来的。我们从社会所得到的投入，和我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是天平的两端。拿我来说，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并不容易。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全家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我的母亲很节俭，目的就是要让孩子都受到教育。母亲去世后，姐姐供养我念书。清华毕业后，出国留学用的是庚子赔款，是人民的血汗。这些都是社会花在我身上的投资。社会对我有这么多的投入，我自己产出多少，这个问题不能不想。我觉得自己的产出远远不够，这不是虚话，是实情。

我最近准备写跟 Park 学社会学的文章。我在大学时期学他的社会学，可是没有学通，现在感到需要重新看。我把自己上大学时候读过的教材找出来重读，包括 Park 的书，有些地方还是看不懂，还要细细地想。这也是从实求知。有了几十年的学术工作实践，再回到提供早期学术训练的基本课程里边，进一步体会实践知识怎样接通书本知识，书本知识怎样推动受教育者更自觉地进入学术实践。

说到教育问题，我们这一代算是好的了，下一代人的条件比我们要差，主要是基础教育差。讲起来很有趣，我父亲是最后一

代的秀才，科举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变办法以后，在考取的秀才中挑出比较好的，送出去留学。我父亲被送到了日本，学教育。他留学回来就搞新学，办了一个中学。后来他到了南通，张謇请他去那里教书。我名字里这个“通”字就是这么来的。我母亲创办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我从小就是在这个蒙养院里边长大的，所以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人之初，性本善”，这话很有哲理，可是我从小没有念过。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务印书馆出的小学课本，是新学的东西。我父亲是处在文化变迁时期的一代人物，他主张新学，不要旧的一套，在儿女身上不进行旧式的教育。所以我缺了从小接受国学教育这一段。最近我在看顾颉刚、傅斯年、钱穆这样一些人的传记，他们都是从私塾里边出来的，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和上一代人的差距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学的根子在我这里不深。

李：我这一代就更没有了，完全是新学了。

费：因为缺少国学的知识，我也吃了很大的亏，讲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不容易体会到深处的真正的东西。看陈寅恪写的书，我想到了两个字：归属。文化人要找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是在找归属。我从小没有进到旧的文化教育里边去，所以我的归属是在新学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的。陈寅恪的归属是过去的时代，他写《柳如是别传》写得真好，他能同明清之际的知识分子心心相通。我同上一代人比，在中国文化的底子上差得很多，这是真的。可是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历史的变化造成的，是不能不如此的。但是也要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面对的问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长处。我这一代人的长处是比较多地接触了西方的东西。

李：您是先有了一个西方的架构，再倒过来看自己，思考问题。

费：Arkush 为我写了一本传记，用一个西方学者的眼光来看我，缺了一段，就是我的中国文化的底子。可是我的中国文化底子既不是顾颉刚那样的，也不是钱穆那样的……

李：他们是纯粹从大传统里边、从经典里边得到的传统文化，您是从一般人的实际生活里边得到的中国文化。这不一样。他们也许没有对实际生活的系统观察和体验，您是经常性地接触实际生活，面对生动的现实进行思考，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这一点是他们所没有的。

费：我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到农民里边去的。可是实际讲起来，还不是真正的农民的心理。

我的本质还不是农民，而是大文化里边的知识分子，是士绅阶级。社会属性是士绅阶级，文化属性是新学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最初我是从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出来的，有西方文化的基础。后来到了英国留学，就更进一步接触了西方的文化。回国之后，我自己有意识地投入到中国农民和少数民族里边去。我对旧的大文化的了解不深，对新的农民小文化的了解也不深。在这样一种底子上进行学术研究，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很不够。这样一种分析很有意思，代表了我一生的经历。这不是我自己造出来的经历，而是历史决定的。我这样一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时代，经历这样一番变化，回头看看，的确很有

意思。

李：像陈寅恪、顾颉刚他们那样一种学术研究，没有办法提出一套可以供全世界的学者了解的人们如何相处的理论。您一开始就提出的“差序格局”的想法，是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您提出的理论，是一个有了一番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中国学者提出的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和理论。这个理论架构是有长久生命力的，直到现在，研究生们还经常引用这个理论。我在想，在您这样一类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能不能再追进去一层，看看在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当中，在中国的文化秩序当中，哪一些可以提供给将来在 21 世纪生活的人们，有益于他们懂得容忍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形成一些大家愿意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超越东西方的界限。如果中国文化里边确有这样的值得挖掘出来的东西，也只有您这样的长期思考、深入思考，并能提出全局性主张的人，才能把它挖出来。

费：实际地讲，这确实是我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社会上的文章里边经常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变成了毛泽东思想，现在又变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也是中国化，同德国的马克思，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这说明有一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中国特点，在那里影响外边进来的东西。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总是在那里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是什么？特色在哪里产生出来？现在还没有人能把它讲得很清楚，原因就是并没有好好研究。西方的学者，像 Durkheim 那样的，他就可以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讲出来，像 Weber 那样的，他就可以把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和文化背景讲出

来。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进来后变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这背后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可是这些文化特点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们却说不清楚。我觉得，研究文化的人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应该答复这个问题。

李：您提出一个命题，作出一个暗示，可能会引导后人跟上来，接着往前走。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您有时候也谈到过一点想法，以后还可以继续思考，把思考结果提供给大家。年轻人没有您这样的身世，没有您这样的经验，一时还不具备您的思考深度，所以既需要您点题，也需要您破题，需要您把想到的写下来。虽然不一定很成熟，但是可以暗示他、刺激他思考问题，也许就能上路，逐渐地发展起来。我看您最近写的文章，都还是很有意义。忽然就提出一个人家想不到的事情，忽然就提出一个人家想不到的问题，启发了人家的兴趣和思考。一个人的生物性生命是有限度的，他的文化思想的生命却是可以长久地延续下去的。您的学生，或者是别人，看了您的文章，再把其中的思想发挥下去，文化的生命就这样延续下去了。我们常讲的Durkheim，他的思想经过 Strauss 等人的发展，学术的生命就延续了一个多世纪。

费：看到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特点。我有一次和胡耀邦在一起谈话，他表现出一种重视家庭的思想，把家庭看成是社会的细胞，他的这个思想是从实际里边出来的。我是赞同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的，这个细胞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的农业生产在人民公社之

后回到了家庭，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一下子就解放出来了。我从这个事情上再推想一步，我们的农村工业化，恐怕也离不开家庭力量的支持。最近我又到浙江、福建、山东等地的农村里去跑了一圈，亲眼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就是家庭工业。家庭工业规模很小，一家人在一起搞，心很齐，肯出力，不浪费，效率很高。当然它的技术水平还不高，但是劲头很足。一回到家庭，怎么干都行，甚至能发挥出超常的力量。如果整个国家能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那我们就不得了。

胡耀邦讲过家庭的重要性之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的《生育制度》的话题还没有讲完，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把这样的社会事实充分地调查清楚，研究透彻，并且用现在的话讲出来，这是我们的责任。要让陈寅恪、顾颉刚这一代人做这样的事情，恐怕不行。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处是接触了这个现代化的世界，我们的语言可以 communicate with the world，可以拿出去交流，人家可以懂得。我叫它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我们这一代接受新学教育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长处。上一代人的长处是对传统文化钻得深。为了答复中国文化特点是什么的问题，上下两代人要合作，因为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特点，必须回到历史里边去。我们这一代人中还要有人花工夫，把上一代人的东西继承下来。不能放弃前面这一代人的成就。这条线还要把它理清楚，加以发挥、充实。陈寅恪、顾颉刚的成就是清朝的考据之学，它是有根的。我们要保住根根。这也是中国思想的

一个特点。傅斯年多少接下來了一点，胡适已经近于我这一代了。我们要接下上一代的好东西，发扬下一代的新精神。在这个文化的传承过程当中，自己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明确在这条线上我处在哪个地方，该做点什么事，做到什么程度。我在想这些问题，想得很有趣，可是能讲这个话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下面这一代人，像我的女儿，她就不大能懂我的意思了。不能怪他们，教育破坏得太厉害了，接不上啊。看来继承性应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使它能够继承下来，这个东西也许就是 kinship，亲亲而仁民。我一时还讲不清楚，但是在慢慢想这个问题，希望能想清楚，把想法丰富起来，表达出来，讲明白，使人家能容易懂得。表达可以有各种办法，我喜欢写散文，最近写了一些散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写我思考时间比较久的话题，短文章容易表达临时来的一些灵感。

李：您为这次学术演讲做准备的这一篇学习马老师文化动态论的体会，也很重要。您讲到，马老师看到了非洲殖民地上的本土文化面临着解体和消失的困境。现在我们倒过来看中国，我们虽然没有被殖民，但是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可见非西方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接触之后所处的情况大都是一样的。不过，我觉得目前的情势应该是有转变了，虽然 Samuel Huntington 还在讲他的文化冲突论，但是如您前面所说的，现在应该是讲究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时代了。21 世纪即将来临之时，人类的各种族各文化应该讲究互相容忍、互相沟通了解，以至于互相欣赏的时候了，也就是您前面所说的“美人之美”的意